

周兴陆 著

中國文端通史



復旦大學出版社



卷一

21世纪复旦大学研究生教学用书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成果（12BZW074）

本书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出版

中國文端通史

周兴陆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论通史/周兴陆著.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8. 9
21 世纪复旦大学研究生教学用书
ISBN 978-7-309-13616-6

I. ①中... II. ①周... III. ①文学理论-文学史-中国-研究生-教材 IV. ①I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68142 号

中国文论通史

周兴陆 著

责任编辑/关春巧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 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 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 86-21-65109143 出版部电话: 86-21-65642845

上海浦东北联印刷厂

开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36.5 字数 622 千

2018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3616-6/I · 1102

定价: 12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导论·····	1
---------	---

第一编 文学理论批评的源头

第一章 儒家文学理论批评的奠基·····	17
第一节 文学与文章·····	17
文德 / 博学于文 / “文学”独立 / 先秦的“文章”概念 / 汉代以后的“文章”概念	
第二节 言语与修辞·····	24
言语 / 修辞 / 君子必辩 / 言语与文体	
第三节 “诗言志”与孔子论诗·····	31
诗 / 诗言志 / 兴于诗 / 兴、观、群、怨 / 思无邪	
第四节 “赋诗言志”和“以意逆志”·····	40
采诗 / 赋诗言志 / 知言养气 / 以意逆志、知人论世	
第五节 《乐论》与《乐记》·····	50
尽善尽美 / 感于物而动 / 声音之道,与政通矣 / 声、音、乐 / 乐者,天地之和也 / 乐合同,礼别异 / 致乐以治心 / 贵雅乐而贱邪音	
第六节 《毛诗序》与儒家诗论的确立·····	58
《毛诗序》 / 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 / 风、赋、比、兴、雅、颂“六义” / 主文而谲谏 / 变《风》、变《雅》 / 诗者,天地之心	
第二章 老、庄思想的文论启悟·····	67
第一节 道与言·····	68

	有与无 / 道与言 / 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 天籁 / 道法自然	
第二节	道与技	77
	万物与我为一 / 道与技 / 玄览与游心	
第三章	文人精神与“骚怨”传统	87
第一节	发愤以抒情	87
	发愤以抒情 / 发愤著书 / 不平则鸣 / 诗,穷而后工 / 小说 戏曲的“发愤”精神	
第二节	依经论骚	96
	原也过以浮 / 非明智之器,可谓妙才 / 夫《离骚》之文,依托 五经以立义焉 / 依经论《骚》,四同四异 / 正声何微芒,哀怨 起骚人	
第三节	汉魏六朝的赋论	106
	赋者,古诗之流也 / 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 / 赋 体物而浏亮 / 情以物兴,物以情观 / 虚与实	
 第二编 文学理论批评的自觉 		
第四章	文士、文体、文集与文论	119
第一节	文士身份的确立与作家论	119
	文人与文儒 / 从曹丕到范晔的“文人”观念 / 文以气为主 / 才、气、学、习 / 岂曰文士,必其玷欤 / 盖士之登庸,以成务 为用	
第二节	文体论与六朝时期集部的出现	128
	四科八体 / 体有万殊 / 文笔 / 五言居文词之要 / 四部分类 与早期集部	
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的文论著作	139
	曹丕《典论·论文》 / 陆机《文赋》 / 刘勰《文心雕龙》 / 钟嵘 《诗品》 / 萧统《文选》 / 徐陵《玉台新咏》	
第五章	诗文理论批评的自觉	149
第一节	诗文审美特征论	149

	诗缘情 / 综辑辞采、错比文华 / 情采 / 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 / 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	
第二节	诗文创作论·····	159
	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 / 陶钧文思,贵在虚静 / 思理为妙,神与物游 / 灵感与养气 / 通变 / 声律论 / 事类	
第三节	诗文功用论、鉴赏论和历史观·····	172
	经国大业、不朽盛事 / 自通、自娱 / 知音 / 博观、六观 / 观文者披文以入情 / 深识鉴奥、玩绎方美 / 时运交移,质文代变	
 第三编 分体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 		
第六章	诗歌理论批评·····	185
第一节	兴寄、讽喻与意境·····	185
	初唐诗格与律体定型 / 情绪为先,直置为本 / 兴寄、逸兴 / 兴象与风骨 / 讽喻 / 意境	
第二节	从“缘情”向“尚意”的诗学转向·····	203
	“有为而作”的消歇 / 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 / 黄庭坚重释诗本旨 / 韵	
第三节	活法与妙悟·····	213
	无一字无来处 / 活法与悟入 / 作家各自一风流 / 方回的“格高”论	
第四节	兴趣、格调与神韵·····	227
	标举盛唐 / “兴趣”说 / “格调”说 / “神韵”说	
第五节	尊宋诗学的崛起·····	245
	唐宋之辨 / 明末清初人论宋诗 / 叶燮 / 翁方纲 / 同光体与近代的尊宋诗学	
第七章	词学理论批评·····	262
第一节	宋代的词论·····	262
	隋唐燕乐 / 声诗、曲子词 / 关于柳永词的评论 / 关于苏轼词的评论 / 词“别是一家”	

第二节	明清的词论·····	274
	婉约与豪放 / 阳羨和浙西词派 / 常州词派	
第八章	文章理论批评·····	287
第一节	骈散论·····	287
	骈文论 / 古文论 / 语录	
第二节	文与道·····	298
	文以明道 / 文以载道 / 作文害道 / 本色与自得 / 气盛言宜 / 文、道分离论	
第三节	“辞达”和“义法”·····	311
	“陈言务去”和“简而有法” / 苏轼释“辞达” / 义法 / 义理、考据、辞章 / 神理气味、格律声色 / 因声求气 / 阳刚阴柔与古文四象	
第九章	小说理论批评·····	324
第一节	文言小说理论批评·····	324
	目录学上的“小说”及其分类 / 唐传奇论 / 《聊斋志异》论	
第二节	通俗小说之外论·····	334
	通俗小说之褒贬 / 通俗小说动机与功用论	
第三节	通俗小说之内观·····	342
	“演义，以通俗为义也者”——历史演义论 / “说不极于诞者，不足以耸人之闻”——小说虚构论 / “寄意于时俗”——世情小说论	
第四节	小说名著的评点·····	353
	小说评点的源头 / 《水浒传》评点 / 《三国演义》评点 / 《金瓶梅》评点	
第十章	戏曲理论批评·····	373
第一节	优戏、杂剧、传奇和花部·····	373
	优戏 / 杂剧论 / 南戏与传奇 / 南北戏曲比较论 / 花部之兴	
第二节	情感、本色、人物和结构·····	384
	能道性情者莫如曲 / 本色论 / 人物论 / 结构论	

第四编 文学理论批评的近现代转型和新生

第十一章 文学理论批评的近现代转型·····	399
第一节 从“性灵”论到“人的文学”·····	399
陆王心学的文学启悟 / 泰州学派与晚明“性灵”论 / 竟陵派 / 袁枚“性灵”说 / 龚自珍的“尊情”说 / “摩罗诗力”和“人的文学”	
第二节 晚清的经世思想与文学界革命·····	418
文论中的经世思想 / 诗界革命 / 小说界革命	
第三节 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	429
胡适与陈独秀 / “五四”时期的文学新观念 / 革命文学论	
第四节 从保存国粹到中国作风、中国气派·····	442
从保护文言到提倡大众语 / “学衡”派之昌明国粹、融化新知 / 中国本位的文化论 / 民族文学运动 / 从“大众文学”到“中国作风、中国气派”	
第五节 纯文学观的中国化·····	457
王国维 / 文学审美论 / 朱光潜 / 早期创造社的文学观 / 文艺自由论	
第十二章 现代分体文学理论批评·····	477
第一节 诗学的现代转型与探索·····	477
白话诗论 / 胡怀琛的“新派诗论” / 新格律论 / “纯诗”论 / “大众化”和现实主义诗论 / 新诗现代化	
第二节 “词的解放”运动和“新乐歌”的创建·····	494
词的解放运动 / 自由词 / 新体乐歌	
第三节 文章理论的古今演变·····	503
从骈文到美文 / 桐城文统的延续与转型 / 报章体 / 从美文、小品文到杂文 / 朱自清论散文	
第四节 小说理论的变与通·····	520
“兴味派”及其清算 / 从自然主义到新现实主义 / 短篇小说论 / 小说艺术论 / 传统小说形式的新生命	

第五节 旧戏现代化与话剧民族化·····	535
清末的旧戏改良 / 春柳社和“文明戏” /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 新旧戏之争 / “国剧”运动 / 从左翼到抗战的戏剧理论	
结语·····	548
中国文论的本质是“大文学观” / 中国文论的主要特征 / “文以载道”的古今演变 /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主要参考文献·····	562
后记·····	574

导 论

中国文论的研究,在近二十年里曾出现两个重要的话题,一是中国文论“失语症”,二是中国文论的古今演变。这实际上是涉及整个中国文化的“中外古今”的问题。

先谈“中”与“外”。

一百年前,王国维在《论近年之学术界》里用“能动”与“受动”来概括中国学术史:先秦诸子是我国思想的能动时代。自汉代以后,学界稍稍停滞,思想凋敝,这时佛教传入,自六朝至于唐代,佛学兴盛,这是我国思想受动的时代。至宋儒出,将我国固有的思想与印度的思想化合调和,这是“由受动之时代出,而稍带能动之性质者”^①。自宋以后至清朝,思想又逐渐停滞。至晚清时,西洋思想涌入,我国思想将进入新的受动时代。王国维的本意是说,每当一国思想陷入凋敝停滞之时,需要接受外来新鲜思想的刺激,若能做到本土与外来思想的“相化”,必然会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继续前进。

具体到中国文学与文论的历史,外来文化的每一次冲击都激发本土文学的活力,促其新生。魏晋南北朝时期,如果没有佛学思想的引入并与道家思想相交融而产生对儒家思想禁锢的冲决,就不可能有“文学自觉”的发生、文学创作与理论上的繁荣。刘勰撰著出“体大虑周”的《文心雕龙》,正是得益于十余年在南京定林寺整理佛经的知识积累和思维训练。盛唐时期文艺的繁荣也是中原与域外文化交流的结果。元代杂剧的兴盛是在宋杂剧和金院本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南北艺术形式的融合。中国古代的各种文艺,很少是单一元素纯粹不受外来影响的自然延伸,而是本土与外来、庙堂与民间、南方与北方、正统与异端等不同因素相互冲突、相互交流、相互融合而不断创新发展的结果。文学更是如此。从时代性来说,六朝之于两汉、唐代之于六朝、宋之于唐,等等,每个朝代的文学相对于前代都有明显的变化,有的变化甚至非常巨大,如元之于

^① 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王国维全集》第一卷,浙江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21页。

宋。到了明代，汉官威仪又粲然复见。我们与现代文学在时间上相距甚短，还不能够摆脱“历史的近视”，因此容易震惊于现代文学的巨大变异，惊诧于固有文化的沉沦、外来文化的鲸吞。如果把过去一百年放在历史的长河中来考察，是非常短暂的。20世纪现代文学理论的这场深刻变化，尽管看似是全新的，但也不见得比历史上的历次变革更为耀眼。汉魏、隋唐、唐宋、辽金元、明清，历代文学和文论都有着深刻而显著的变化，我们可以容忍这种变化，并把它们放在同一条历史脉络中去认识，为什么单单惊诧、排斥20世纪这场文论的变革？惊呼文论“失语”呢？

“失语症”的提出是有原因的，且不去谈背后的“新东方主义”思想，单就中国文化的现代道路来说，提出“失语症”，并非无的放矢。陈寅恪曾赞叹：“中国文化之同化力可谓强矣！”在古代，中原汉文化的发达程度要远高于周边的少数民族文化，因此汉文化能在不失自我根基的前提下同化外来文化，而不是被外来文化所同化。佛学传入中国并没有彻底动摇儒学的根基，而是经过中国文明的同化演变为禅宗。元代和清代，统治者虽然一度曾有过削弱甚至消灭汉文化的念头，但最终还是儒学治国。每当汉文化的根基受到威胁、动摇时，就有人出来志乎复古，以求开新。韩愈和宋儒对孟子心性之学的提倡，清儒对儒家经义的重新考辨，无不是走复古以求新的道路。传统是开掘不尽的源头，总能为现实困局提供活水。但是到了近代，中国固有的国体被动摇了，传统文化的根基随之而松动倾颓。过去，中原汉文化对周边文化保持居高临下的优势；近代，面对的是伴随工业文明汹涌而来的欧洲文化，中国文化失去了自然的优势，而被视为落后、保守、该被抛弃的旧文化。国人不再是返求诸古，复古以维新，而是“别求新声于异邦”^①，解决现实困局的思想资源不再是来自远古圣人的经典，而是来自欧美的异质文明，参照系不再是远古汉唐，而是近代欧洲。面对欧美文化，汉文化失去了优势，它的运数，不再是同化对方，而是可能被对方同化。所谓的“失语症”就是对中国文化这种命运的担忧。曹顺庆先生曾颇为遗憾地警诫：

中国现当代文化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一整套话语，长期处于文化表达、沟通和解读的“失语”状态。因此，重建中国文化话语具有相当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因为中国文化要想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重新建构自己的理论话语，否则，就只能充当西方文化的摹仿者、追随者甚至附庸。^②

这段富有理论洞见和警示意义的文字曾引起许多学者的共鸣。

① 令飞(鲁迅)：《摩罗诗力说》，《河南》1908年第2期。

② 曹顺庆：《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中外文化与文论》(1)，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0页。

回头看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就是钟摆在“复古以维新”和“别求新声于异邦”两条道路之间来回。当固守传统而出现停滞凋敝时,就别求外来文化的刺激,打破禁锢,出现转机;当外来文化过于泛滥而威胁到固有文明的根基时,又会遭到排斥,重新提倡宗经复古,以消纳外来文明,创造新局面。“失语症”的提出,是在20世纪中国向异域别求新声以至于有可能动摇中国文化根基之后,钟摆转向的另一个方向。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会向传统文化汲取更多的优秀的思想资源来解决当前文化的困境,传统文化将会在当代思想文化建设中具有更大的意义。

再谈“古”与“今”。

20世纪上半叶,研究中国文学史并没有限定何为古代,何为现代。不论是思想比较趋新的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还是立论更显稳健的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都是横跨新旧文学作一贯的阐述。当时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如刘贞晦、沈雁冰的《中国文学变迁史》(1921年)、凌独见的《新著国语文学史》(1923年)、谭正璧的《中国文学史大纲》(1925年)、赵景深的《中国文学小史》(1930年)、杨荫深的《中国文学史大纲》(1938年)等,都是把现代新文学纳入整个中国文学史的统绪中去叙述。新中国成立以后,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作了学科上的划分,似乎是不相关的两橛。古代文学史到清末结束,现代文学史从《新青年》“文学革命”开始。古代与现代之间的壁垒在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同样存在。过去各种“中国文学批评史”都是到清末为止,而几种“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则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谈起。古代文论与现代文论之间各自为政,不相交涉。

章培恒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末提出中国文学的古今演变研究,旨在填平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人为划下的鸿沟。章培恒先生说:“研究古代文学,应当立足在对现代文学的了解上,又必须同对现代生活比较准确的了解相联系,离开了这点,就很难搞好古代文学的研究了。也只有了解文学发展的历史趋势,再把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联系起来,我们才能对文学从古到今的历史发展,有从初步到日益深入的理解。”^①

上述中外与古今的两方面问题,表现在中国文论研究上,归结到一点,就是传统文论与现代文论之间具有怎样的“通”与“变”的关系?传统文论发展至清末,其去向在哪里?“五四”以后的现代文论,其来路在哪里?传统与现代文论如何接榫?这是我近几年一直在思考而想要回答的问题。这里试提出以下几点不成熟的看法,期望能引起进一步的思考。

^① 章培恒:《中国文学的古今贯通》,《解放日报》2004年7月4日。

一、“中国文学”是在现代文学观念下的重新建构

我们现在谈的“中国文学”，是一个内涵与外延都被重新建构的概念，事实上不存在一个从古至今自然发展、轨迹明晰的“中国文学”。虽然“文学”一词早在《论语》中就出现了，但指的是“博学于文”，后世的“文学”多是指一种掌校典籍、侍从文章的官职，与今天所谓以抒情、形象、虚构、想象等为要素的“文学”截然不同。古代的“文”和“文章”与今天的“文学”似乎比较接近，但古代的“文”和“文章”只包括诗与文，不包括小说、戏曲之类，所以从外延上说，与今天的“文学”也不相同。即使古代“文章”中所包含的“诗”与“文”，以现代的“文学”概念为衡量标准，也有相当一部分算不得“文学”，比如姚鼐《古文辞类纂》和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都是古代的“文章”选本，但有多少内容在今天被公认是“文学”呢？在20世纪之前，没有一部书把诗、文、小说、戏曲编纂在一起，纳入一个系统之中，视为“文学”或其他什么。即使从图书分类来看，诗文归入集部的别集、总集，词和戏曲又归入集部的词曲类；小说归入子部，但有的小说如《三国演义》之类多归入史部。也就是说，像现在通行的选入诗、文、小说、戏曲的“中国文学作品选”在20世纪之前是从来没有的。

我们现在若去分别描述中国古代诗歌、文章、小说、戏曲的发展史，是脉络清楚、有迹可循的。若要去描述“中国文学”的发展史，只能是把诗歌（词）、文章、小说、戏曲四条脉络按时间线索“汇合”起来，而历史上，这四条脉络虽有交叉影响，但却是独自流淌的，并没有汇合成一条河流。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literary”“literature”概念被对译为“文学”并传入中国，就开始用这个“文学”概念来建构“中国文学”。用西方的“文学”概念来面对历史悠久、数量庞大的中国材料，处理起来是棘手的。比如1900年英国人翟理斯(H. A. Giles)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就被郑振铎指摘出“疏漏”“滥收”“详略不均”“编次非法”等毛病，被批评为“百孔千疮，可读处极少”^①。翟理斯“第一次把中国文人向来轻视的小说与戏剧之类列入文学史中”，也就是说，他是按照西方的“文学”概念来重新梳理中国材料，建构起“中国文学”的历史，观念与对象之间不能做到无缝对接，自然会出现“疏漏”“滥收”等毛病。而窦警凡的《历朝文学史》作为国人自著的第一部中国文学史，分别论述经、史、子、集，实是一部国学概论，并非真正的“中国文学”史。从这一西一中两部早期文学史，就可以看出“中国文学”在20世纪初刚刚建立时的尴尬，要么像

^① 西谛(郑振铎):《评H. A. Giles的“中国文学史”》，《文学旬刊》1922年第50期。

翟理斯那样用源于西方的“文学”概念对中国庞杂的材料作重新的裁汰梳理，要么像窦警凡那样，固守“国学”传统，用传统的“国学”偷换新起的“文学”概念。这是两条不同的道路。事实上在 20 世纪里，很少有人延续窦警凡的道路，占绝对主流的，还是翟理斯的路数。虽然郑振铎对翟理斯处理材料多有批评，但是对于翟理斯的文学观念，他是肯定的，他称赞翟理斯重视小说、戏剧，注意到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这两点足以矫正对于中国文人的尊儒与贱视正当作品的成见，实是这书的唯一的好处”。此后主流的“中国文学史”一般都是延续翟理斯的路数，采用西方的文学观念对中国材料加以重新选汰，建构出“中国文学”的历史，不过在对中国材料的处理上尽力避免“疏漏”“滥收”等毛病。

当然，中国传统文学并非完全原封不动地接受外来“文学”观念，被动地处于被建构的位置，反之，它修正了人们对外来“文学”观念的接受。西方近现代的“纯文学”观念一般只包括诗歌、小说、戏剧三类，早期的一些“中国文学史”只包括这三类，不涉及文章。然而在中国古代，“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①，不仅数量大，成就高，地位也远远高于小说、戏曲，古代的“文集”“文论”一般都包括诗，如《文心雕龙》就列有《明诗》篇，诗只是文章之一体。谈中国文学史忽略文章，总是说不过去，因此 20 世纪 30 年代以后的一些“中国文学史”都把历代的骈、散文纳入进来，对“文学”概念外延的理解扩大到诗、文、小说、戏曲四类，算是对西方“三分法”的修正和补充。这说明我们接受了西方的“文学”概念，又对它作了适当的修正。

今天我们研究中国文学，是回到窦警凡的“国学概论”的道路上，还是沿着主流的道路接受既定的“文学”观念而继续加以修正？我觉得都可以进行尝试。从“国学”的大范围来谈“文学”有它的可取之处；注重于“文学”的特别属性而重新建构中国文学的统绪也有其合理性，在今天谁也不能把小说、戏曲排除在文学之外，或只认诗歌、小说、戏曲是文学正宗，但我们更需要尊重中国古代的诗歌、散文、小说、戏曲相互之间虽有关联却又各自独立发展的事实。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也是如此，诗论、文论、小说理论、戏曲理论之间虽有关联却是各自独立发展的，比如杜甫的诗歌创作登上顶峰，对诗歌理论也发表了重要的见解，但是在文章方面，不论是创作还是理论，成就都是有限的。韩愈是古文运动的领袖，但在诗歌理论上，也没有比较卓异的见解。古代真正像金圣叹那样在诗、文、小说、戏曲批评上都花过大力气、取得大成就的人，凤毛麟角。

^① 曹丕：《典论·论文》，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 1958 年版，第 1098 页。

诗、文、小说、戏曲各体理论之间虽然有关联、有影响,但总体上是独立发展的,我们应该尊重这个事实,把各体理论演化的轨迹和特征研究清楚。有的特定时期各体文学和文论表现出总体性特征,比如六朝时期诗与文都比较繁缛,追求辞采之美,在这个时期文体的时代共性大于各体个性。后来各体文学和理论愈益分向发展,文体特性更为明晰。再如晚明时期,“不拘格套,独抒性灵”的精神在诗、文、小说、戏曲创作和理论上都有表现,且不仅如此,这种精神同样表现在绘画、音乐、工艺等其他艺术门类上,是整个时代思潮的特征。各体文学理论在时代思潮影响下表现出共性。我们今天在研究古代文学理论批评时,既应该把各体理论的特点、各自的发展历程叙述清楚,也应该把它们受时代思潮影响而表现出的共性揭示出来。

但如果我们只是抓住一个总体性的“文学”观念不放,而以之来回溯中国传统文学和文论,就会消解各体文学与文论发展的独特性,得出似是而非的结论。比如郭绍虞先生 1934 年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就是“以自己一元的史观,来解释中国文学批评演变的形势”,从纯文学观出发而得出结论说,前期(自先秦至南北朝)是文学观念由混而析的时期,后期(自隋唐至北宋)又成为文学观念由析而混的时期,南宋以后则是文学批评的完成期,批评史的发展是“正—反—合”的波浪式的进化,从文学观念演进期到文学观念复古期,再到文学批评完成期。郭绍虞先生的著作有其时代性,在当时对于推动纯文学在国内的传播和接受是有意义的,但是今天看来,他把中国文学观念的演进解释得如此井然有序,合乎逻辑,恰恰是把丰富多彩的历史简单化了,实则远离了历史真实。今天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和文论,依然需要采用“回溯”的办法,但如何不观念先行,不固守成见,如何更尊重中国文学自身的传统,是值得认真对待的问题。

二、国外文学与文论思想的“中国化”促使 现代文学和文论实现质的飞跃

中国社会发展到晚清,已经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辛亥革命后,传统专制制度解体;从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种变化不同于过去的改朝换代,而是从国体到政体、从经济到文化全方位地从传统走向现代;也不同于过去的异族入主中原,而是面对外来文化的强力冲击,面向世界,走向开放。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之下,中国现代文学与文论显露出崭新的面目,与传统相比有质的飞跃。乃至有人感叹中国现代文学脱离了传统,与传统文化断裂了。施蛰存先生在 20 世纪 30 年代就说过:

新文学运动兴起以后,我国的小说,正如诗与散文一样可以说是与旧的传统完全脱离,而去过继给西洋的传统了。^①

至 20 世纪 80 年代,林毓生在《中国意识的危机》里提出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彻底的、全盘的、整体性的反传统思想。“五四”新旧断裂说迅速成为一个颇为流行的观点。然而“断裂说”只是过于强调现代对传统飞跃的方面,它忽略了现代与传统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五四”以后的中国文学和文论的确是采取“大破大立”的革命式推进,这种模式为 20 世纪文学演变的主流。通过这种大破大立的革命,文学面向社会,走进生活,贴近大众。陈独秀 1917 年在《文学革命论》中所提出的“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的任务,是实现了的。西方的各种思潮进入中国文学,极大地改变了中国文学的基本格局、精神实质和呈现景观,特别是文学参与了现代的社会变革,担负起了社会变革所赋予的任务。不论是从哪一个层面来说,现代文学与此前的明清时期文学相比都有显著的进步。不能因为现代文学史上没有出现一部像《红楼梦》那样的文学巨著,就否定说现代文学不如明清。从文学对人性的表现和尊重,文学表现社会的广度和深度,文学对社会、对读者的影响程度,文学自身的理论反思和探索,文学思潮演化的活跃程度,等等,都可以说现代文学是对传统文学的一个飞跃。能不能因为传统的“文以载道”论被破坏了,白话文学代替文言文学而占据文坛主导地位,文学表现形式出现大量的欧化现象,便得出新旧文学“断裂”的结论呢?显然不能。章培恒先生在《中国文学的古今贯通》里说:“‘五四’新文化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必然要到达的驿站,不过在外国文化的影响下,提早出现了若干年而已。”同样的道理,现代文学和文论是传统文学与文论在现代社会文化背景中的合理发展。

现代文论是在引入西方文论之后逐渐成长起来的,与传统之间的确有很大的差异。在西方文明基础上产生的西方文学理论,以其系统性、逻辑性,被当作“科学的”理论引入中国。在 20 世纪之初,王国维就引入康德、叔本华、尼采的文学美学理论,并以之抨击传统的政教文学观,解释传统的诗词和小说,是现代文学理论建设的先行者。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国外的“人性论”“人生论”“审美论”等文学理论大量被引入国内,彻底冲决了传统文学理论的藩篱。1922 年,茅盾曾说过:

^① 施蛰存:《小说中的对话》,《宇宙风》1937 年第 39 期。

中国一向没有正式的什么文学批评论。有的几部大书如《诗品》《文心雕龙》之类，其实不是文学批评论，只是诗、赋、词、赞等等文体的主观定义罢了。所以我们现在讲文学批评，无非是把西洋人的学说搬过来，向民众宣传。^①

当时的文学批评史研究，如杨鸿烈的《中国诗学大纲》（商务印书馆 1933 年版），就是试图用严密的科学方法把中国各时代所有论诗的文章，归纳排比起来，并援引欧美诗学家研究所得的一般诗学原理来解决中国诗里的许多困难问题。这在当时是比较普遍的学术模式。正如朱自清所说，“现在学术界的趋势，往往以西方观念（如‘文学批评’）为范围去选择中国的问题，姑无论将来是好是坏，这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事实”^②。或许站在今天的角度看问题，对于这种“重释”不免会有责难。但是，传统文论以其原生形态是无法进入现代生活的，必须通过这种阐释，在意义的增减、调配中实现现代化。在 20 世纪里，对这种“以西释中”模式也是常常有警觉的。罗根泽曾说：

学术没有国界，所以不惟可取本国的学说互相析辨，还可与别国的学说互相析辨。不过，与别国的学说互相析辨，不惟不当妄事糅合，而且不当以别国的学说为裁判官，以中国的学说为阶下囚。糅合势必流于附会，只足以混乱学术，不足以清理学术。以别国的学说为裁判官，以中国的学说为阶下囚，简直是使死去的祖先，作人家的奴隶，影响所及，岂只是文化的自卑而已。^③

从这段话中可知，罗根泽对于当时文史学术中普遍存在的“以西释中”模式是相当警觉的。1932 年春，由郭绍虞推荐，罗根泽至清华大学代讲“中国文学批评史”课程，编成《中国文学批评史》，讲述周秦、两汉、魏晋六朝的文学批评。他善于鉴别中西异同，提出：“西洋的文学批评偏于文学裁判及批评理论，中国的文学批评偏于文学理论，中国的文学批评大都是作家的反串，并没有多少批评专家。作家的反串，当然要侧重理论的建设，不侧重文学的裁判。……中国的批评不是创作的裁判，而是创作的领导。”这些论断，都是超越了“以西释中”模式而能参校人我，鉴别异同。因此，朱自清在《诗文评的发展》里称赞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是“能将一时代还给一时代”，是“切实的将中国还给中国的态度”；“罗先生这部书的确能够借了‘文学批评’的意念的光，将我们的诗文评的本来面目看得更清楚了”。在文论研究的“以西释中”模式出现不久，在学界就出现了对它的警觉，中国的现代文论并非是西方文论的翻版。中国学者

① 郎损（茅盾）：《“文学批评”管见》，《小说月报》1922 年第 13 卷第 8 号。

② 朱自清：《评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清华学报》1934 年第 9 卷第 4 期。

③ 罗根泽：《学艺史的叙解方法》，《读书通讯》1942 年第 36 期。